

China's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The Historic Significance and Modernity

国企的历史性与现代性

——对新自由主义意识的反思和批判

祁鸣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China's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The Historic Significance and Modernity

国企的历史性与现代性

——对新自由主义意识的反思和批判

祁鸣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国企的历史性与现代性：对新自由主义意识的反思和批判 / 祁鸣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222-11468-5

I. ①国… II. ①祁… III. ①国有企业—企业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F279. 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9830号

责任编辑 王 铊 陈定萍

整体设计 杜 舟

责任校对 陈定萍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国企的历史性与现代性——对新自由主义意识的反思和批判
作 者	祁 鸣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云南人民出版社
邮 编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网 址	650034
E-mail	www.ynpph.com.cn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110千
印 张	11.25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制 版	昆明南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昆明亮彩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1468-5
定 价	30.00元

目 录

导 论

第1章 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意识和理论的历史评述

- 1.1 人性、自由、私有财产、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和历史观/15
- 1.2 古希腊的启示：色诺芬的财产私有、分工和财富管理/19
- 1.3 柏拉图：人性与经济相互作用理论和《理想国》/20
- 1.4 亚里士多德：私有制和市场观念/22
- 1.5 古罗马的贡献/24
- 1.6 阿奎纳：一个神学家的经济思想/26
- 1.7 洛克：劳动创造私有财产——资产阶级理论基础的奠定/28
- 1.8 休谟：财产正义和社会契约学说/29
- 1.9 斯密的人性利己论与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32
- 1.10 哈耶克：自由主义与市场自由的旗手/36

第2章 西方世界的价值意识：从“现代性”到“普世化”；从“特殊性” 到“普遍性”

- 2.1 文艺复兴运动：西方“现代性”的起源/44
- 2.2 启蒙运动：资产阶级的历史机遇/47
- 2.3 西方世界对世界历史的自定义：“现代性”和“普世性”/51

第3章 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意识及其“普世价值”的考察和批判

- 3.1 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意识及其“普世价值”/57
- 3.2 经济危机，政府的“有形之手”以及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复活/74
- 3.3 “全球化”：天使还是恶魔/82

国企的历史性与现代性 //

——对新自由主义意识的反思和批判

- 3.3.1 对拉美国家“全球化”的考察和反思/85
- 3.3.2 对俄罗斯和东欧“全球化”的考察和反思/90
- 3.3.3 中国的“全球化”是怎么走过来的/97
- 3.3.4 西方国家的昨天和今天:对“全球化”态度的两个极端/102
- 3.4 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不合时宜的主张/105

第4章 国有企业的历史性与现代性

- 4.1 对国有企业存在拷问的批判/116
- 4.2 国有企业的历史性/128
- 4.3 国有企业的现代性/137

结语/167

参考书目/169

导 论

我们中国当今的生活世界，不论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乃至日常生活等诸方面都与整个世界紧紧地交织在一起。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来，我们不再闭国自守，在政治上更加开明，在经济上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多元，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越与世界发生紧密的联系，追寻“现代化”，我们似乎越容易陷入别人的概念框架中不能自拔，似乎中国的一切都必须在别人，或者说在西方所定义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在西方的历史语境中寻找命名符号，似乎我们的生活意义和生活世界来自别人的定义。所有这些不外乎是因为，西方国家在近现代以来发展成了具“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它们的发展历史定义了“现代性”和“现代化”。中国自清代以来的落后挨打，使中国人在观念和实践上形成了追赶西方“现代性”和成为“现代化”国家的紧迫感和共识。自“五四”运动以来，从知识界开始一直到社会底层，中国就一直致力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传统权威，进而拥抱和接受西方思想，就一直沉浸于追寻“现代化”的冲动和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

革命，推翻了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建立了完整统一的民族国家，使得自“五四”以来的新民主主义意识和实践迈入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这种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和实践，对所谓以西方意识为标准的“现代性”是完全排斥的，不论是从哲学思想或意识形态上，还是社会实践上，以及经济发展模式上，基本走的都是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那是一条从苏联模式改良过来的道路，但目的是明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事、工农业体系、经济体系，建立独立的、主权的民主国家。从哲学意识和价值观的高度看，那时的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不论如何，走的是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是一条否定以西方为代表的所谓“现代性”和西方价值观“普世性”意识形态的道路，是以自身为历史发展主体的道路。虽然大众革命、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实践从意识形态的理论上来说是一种有关人类幸福的理想和论述，是以消灭阶级，发展经济，实现“绝对”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以及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价值体系，但从实践上看，由于理论和实际脱节的原因以及各种复杂的因素，这种社会主义实践经历了无数波折和起伏，在政治哲学上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和解决实践中的重大问题，没有分清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在经济上没有能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所以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以自身民族国家为历史主体的发展过程中，走的是一条令中国人民为之骄傲和世人为之尊重的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奠定了完整的工业基础和培育了相应的产业大军；生产了众多的人口，为中国今天的发展奠定了庞大的劳动人口和

大众消费市场；在严密的技术封锁中独立自主地研发爆破了原子弹和氢弹、发射了人造卫星，对外部敌对势力产生了有力的震慑；捍卫和传承下了一个仍在执政党领导下的完整和统一的民族国家。“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在思想意识、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各方面都遭受了严重了创伤，但也使中国人民在磨难中成熟起来，在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上学会了思考。所有这些，为后来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战略的实施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1978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国家发展方针，之后又确定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特别是 90 年代以税务改革和之后的以国有企业改革为起点的改革发展道路，奠定了以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经济为主，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方针。特别是中国在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在降低关税、市场准入、平等对待内外资企业等方面全面兑现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在坚持原则和稳步渐进的指导方针下，加快与国际规则接轨，促进了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深化了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经济，充分吸收和消化了人类在历史发展中所传承下来的优秀遗产，已被历史和实践证实确是行之有效的先进的思维、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置和竞争机制、先进的科学和技术、良好的公司管理和公司治理机制。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国有企业发展为主，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形态，使得中国在西方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和发展而设计和推动的“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中抓住了机遇，在经济社会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了今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定义了属于自己的“现代性”，成

为了一个具“现代性”和“现代化”特质的大国。然而，今天的中国不论在社会发展还是在经济发展中都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诸如社会阶层出现裂痕，贫富悬殊扩大，分配机制的不公平，政治和行政体制的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系统性和覆盖面的不完善，东部西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平衡，创新的需求，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压力，经济要素合理有效匹配，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出现不可持续性等等。尽管面临这样那样的困难与挑战，尽管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这并不能阻碍中国已成为一个典型的“现代性”的国家和一个全球性大国。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这既漫长而又短促的国家发展历程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肩负着国家的使命，人民的期望，社会的责任，经济发展的重担，全球竞争的先锋，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历尽千辛，忍辱负重，改革探索，在建国后 60 多年的历史中，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趟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国有企业发展之路。

自近现代以来，资本主义在西方土壤和环境下生存和发展了 200 多年，成为欧美等西方大多数国家的发展体制和政治经济制度。资本主义也被称为市场经济或自由企业经济，其特色是个人或是企业拥有资本财产，投资活动由个人决策左右，而非由国家所控制。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主导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发展。在这样的制度下，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并借助雇佣劳动的手段以生产工具创造利润。在这种制度里，商品和服务借助货币在自由市场里流通。投资的决定由私人进行，生产和销售主要由市

场控制，公司之间互相竞争，依照各自的利益采取行动^①。资本主义的核心是财产私有化、资本的自由流通和自由市场经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 200 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及自由市场经济的洗礼，在不平坦的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自我认识、自我界定、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把不断解决危机和努力延续传统结合起来，历经风雨，逐渐发展成了社会和经济领先的“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从而在其历史发展的语境下定义了什么是“现代性”、“现代化”，定义了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私有财产”以及“公司”、“法人”、“契约”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由于其意识和制度的根本缺陷，在发展的历史中经历过无数次社会和经济的重大危机，使自己和整个世界经济陷入难以恢复的困难境地。但不可否认的是，资本主义有着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创造了人类历史发展上诸多优秀成果和精华。中国等后发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将建成“现代化”作为民族国家发展的最高目标和追求，将西方发达国家列为“现代化”的标杆和榜样来追赶，特别是在经济发展领域尤为如此。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政治上实行了开放的导向和开明的政策，解除了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教条，拆除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水火不相容的藩篱，推行了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励私有部门的经济发展，改革了国有企业原有的、按国家计划经济时期所有的产权和制度，引进了市场和竞争机制以及企业的股份化改造和现代公司治理机制，除了少数几个国有企业由于国家经济安全考虑和作为支

^① 维基百科：《资本主义》，www.wikipedia.com。

柱产业和社会经济稳定原因需要赋予市场垄断地位外，中国目前绝大多数的国有企业都处在市场竞争的环境当中。由于中国的国体、政体、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文化以及历史和现实等原因，中国的国有企业从一开始就肩负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基础和栋梁的重任。企业强则国家强。国有企业在中国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力量，控制着金融、能源、交通、电信、重型装备制造、大宗商品原材料等有关国家经济命脉的诸多产业，是政府实施政治和经济政策的一种工具，在某些方面是政府职能的延伸，是国家可以用来应对突发事件和重大经济风险的中坚力量，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载体。国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相当的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不仅有着重要产业结构的构架和支柱作用，也具有产业组织和导向功能，国有企业是国家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抓手和工具，国有企业不仅对国家财政起着基础和支撑作用，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稳定。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有企业的改革首当其冲地被中国政府列为经济改革的重点领域，就是因为国有企业的上述重要性和对整个改革的先导和支撑作用。国有企业经历了一系列痛苦和艰难的改革，改制改组一直在持续地进行当中。截至 2009 年末，全国国有企业的数量从过去的几十万家缩减为 49137 家，其中，全国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共有 1727 家，中央部门管理企业 170 家，中央企业占 130 家，地方企业 1427 家^①。70% 的中央企业（央企）已经实现了股份制改造，并且 60% 的央企的净资产都在上市公司，这些央企上市公司在美

^① 国务院国资委：《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年鉴（2010）》，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年 12 月。

国、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等地上市。这些央企的资产不仅属于中国 13 亿人民，还有一部分属于国外和国内的战略投资者和广大股民^①。中国的地方国有企业也在大规模地朝着股份制改造的方向前行^②。在全国 928 户省属重点企业中，绝大部分的国企都已实现了股份制的改造，全国大部分省市的国有企业不论是集团层面还是下属二级企业都有公司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更加完善，公司的管理趋于更加规范化和市场化。

只要不带偏见或不是别有用心，应该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中起到了中坚作用和做出了巨大贡献；没有人能够否认，国有企业在市场机制自身无法使一切资源完全出于最优配置的状态下能够承担起提供社会低于成本或风险较大的产品的责任；没有人能够否认，国有企业帮助政府实现了政府也难于实现的政策目标；没有人能够否认，国有企业弥补了非公经济实力不足的弊端，涉足了非公经济不能而且没有能力涉足的领域（如大型国家工程、南水北调、西电东送、青藏铁路、高速铁路、特高压电网、大飞机和航天工程等等）；没有人能够否认，国有企业的纳税表现远远好于私有部门；没有人能够否认，国有企业起到了承接国家实施国家产业和技术政策以及带动全社会深入落实产业和技术政策的先导；应该也没有人能够否认，国有企业应该控制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及重要部门，构成保证国家基本制度和政治生活安全与社会稳定微观基础；没有人能够否认，在重大自然

① 邱宝林：《央企真相》，第 2 页，中国教育出版社，2011 年。

② 国务院国资委：《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年鉴（2009）》，第 63—65 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年 12 月。

灾害和重大事件中，国有企业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也应该没有人能够否认，国有企业为了国家的经济利益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了我们所需的资源、原料、资本、技术、产品和应有的尊重。一旦废除国有企业，对今天的中国的灾难是不可思议的。历史上所有崛起的国家不约而同地都有国有企业不可替代的贡献。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国有企业，在融入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是否会被资本主义意识溶化和吸收、是否会变为少数人或外国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否也会变成西方大众消费文化和全然不同的价值观体系？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讲，国有企业仍然保持着与众不同的价值观体系和特有的文化意识，这种价值观体系与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高度一致的。在今天“全球化”的浪潮中，经济中显现着明显的文化因素，反之，在文化中也显现着经济的影响。国有企业的这种特有的价值观体系和文化在当今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显得尤为可贵和重要。

然而，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中，有一股势力，包括一些奉新自由主义为神明的经济学家、学者以及媒体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就是怎么看都不顺眼、百般挑剔、百般责难，仿佛国企自出身起就是一个怪胎。他们无视国有企业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以来业已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以及在国民经济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所作的贡献，无视国有企业在过去二十多年中经历过的一番又一番的改革洗礼和凤凰涅槃式的重生，无视今天的国有企业与二三十年前大不一样，竞争机制和现代企业管理机制已大体成熟，很多国有企业成为了在国内外的市场竞争中毫不逊色的市场主体。这股势力与西方意识一道，

一切以西方意识形态和理论为参照体系、以西方当前的企业结构为理性状态和坐标系，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巨大进步不屑一顾，视国有企业为阻碍国家发展进步的主要障碍，对国企的批评越来越多。这些新自由主义的追随者一直鼓动“深化改革国有部门”、“重组国有企业部门”、“国企退出竞争性行业”，并极力想把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掉、私有化和最终消除掉。这些人的思想意识就是将源自西方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意识“普世化”，一切以是否符合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行为为准则来衡量的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基于三个假设：人是理性的；个人权利是绝对的；程序是万能的。殊不知，这三个假设即使在西方世界发展的今天都是一个都站不住脚的，是被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几次重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所证伪的。这些新自由主义的崇尚者在各种场合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国有企业的不屑，毫不顾忌地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意识作为“普世化”原则来衡量中国经济发展中所有的“对”与“错”、来断定中国进一步的“深化改革”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拿国有企业开刀。其实他们表达得很直接，最终目的是要将国企私有化。人们不禁要问，怎么私有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后就一定会比公有化好吗？私有化后的企业性质是私人资本所有，而不是像国有企业那样属于全体国民所有，利益属于全体国民。再者，以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现有的体量和净资产规模，什么样的中国私人部门能够“吃”得下来、“消化”得下去呢？如果中国的私有部门没有这样的资金和实力，那只有国外的跨国公司有这样的资金和实力了。如果由外国的跨国公司来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又会是什

么后果呢？

俄罗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在国家解体、政权更迭和制度更替的背景下，在西方世界的推动下，一场以“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为标志的激进变革迅速席卷前苏联大地。这种变革被认为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所有制革命。在俄罗斯私有化的过程中，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约有 500 家大型国有企业被用 72 亿美元低价出售，而这些企业的实际资产多达 2000 多亿美元。除有形资产外，无形资产和知识产权的流失更是无法统计。几年间，私有化的浪潮彻底地改变了俄罗斯原有的社会形态、经济基础和社会阶层结构，催生了大量私人资本、财团和寡头经济的形成。俄罗斯几乎所有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谁得利、谁是赢家？答案是：国有企业私有化得利的不是国家（政府）、不是人民大众、不是企业员工，而是少数的前政府官员和企业的经理层和高管，形成了至今仍控制着俄罗斯经济的寡头型经济。按照《俄罗斯私有化纲要》的规定，官方宣称的私有化要实现以下七个目标：形成一个私有者阶层；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利用私有化所得的收入建立社会保障资金体系；促进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提高竞争力、经济非垄断化；吸引国外投资；为私有化创造条件、建立良好的组织体系。私有化后的俄罗斯经济在过去 20 多年市场经济中的表现，除了第一条外，即形成了一个私有者阶层（但仅仅 70 万 - 90 万人），其它没有一条达到其私有化纲要所期待达到得目标^①。东欧国家一夜之间的国企私有化浪潮又使谁得利？同样不是国家和人民大众，而

^① 张树华：“牢记俄罗斯私有化的教训”，《环球时报》，2012 年 4 月 6 日。

结果是，东欧国家 70% ~ 80% 的工业和金融业的控股权和管理权以极低的价格拱手“送给”了外国资本。东欧国家的政权和人民曾对实行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抱有天真的幻想，心想只有将国有资产彻底的私有化、卖给外国资本，在完美的资本主义制度驱动下和那只万能的“看不见的手”对经济和市场的调节下，他们就会自动地得到他们所想要的幸福生活。可结果又是什么样的呢？那些国家的人民几乎都成了为外国资本卖命的“打工仔”，那些被私有化和外国资本所掌控的企业的绝大部分利益，即国家 80% 以上的金融和工业收益，被输送回到了外国资本拥有人和资本拥有国。俄罗斯与东欧国家私有化结果的最大不同点是，俄罗斯的经济大多仍掌握在本国私人资本手中；而东欧国家的经济命脉则大多被外国资本所拥有和掌握。失去经济发展的掌控权和话语权，也使得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日趋贫化。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华盛顿共识》指导下大规模的私有化后，外国资本掌控了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命脉，并且外国资本也没有像当地政府和人民期待的那样持续加大投入，改善当地的经济环境和保证可持续发展。再则，对金融和经济的管理不善，也使得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经历了多次金融和经济危机，至今经济仍然徘徊在欠健康的状态。

所有这些反问，集中到了问题的核心，即中国是否还需要国有企业，是否国有企业私有化后更能增强国家的实力、更能有效地帮助改善民生和提高全民的整体福利；中国的大多数国有企业是否能够成为或正在成为具有市场竞争力、具有“现代性”一切特征和品质的、能够在全球市场中（包括中国市场在内）与国外跨国企业竞争的市场主体；是否应该

一切照搬和追随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意识普世化的意识形态，将国有企业私有化。

中国国有企业发展到今天所具有的“现代性”特征、如基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产权清晰、全面参与市场经济活动、股份制改造、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竞争、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现代化的企业管理理念等等，是我们对“现代性”的向往和追求的结果，但这本身又是在西方世界所定义的“现代性”的逼压和制约下，带着对它的批判和反思、甚至在反抗和颠覆的冲动中展开。结果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形成了既不像其前身那样带有彻底的否定西方“现代性”以及计划经济的痕迹，也不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公司那样，纯粹为了追逐利润和为股东提供最大利益的企业形态。中国的国有企业既有像所有的企业具有的性质那样，肩负着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责任，但又承担着国家和政府的部分责任和义务，如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这就是国有企业在中国历史和现实环境下所具有的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私有企业的“现代性”，是我们自己所追求和发展起来的“现代性”。

本书将从几个环节来论述和分析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意识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和对其所宣称的“普世性”的考察和批判、中国国有企业发展的历史性和现代性以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发展的核心价值体系。本书还试图做的是，通过梳理现代世界历史内在的思想和实践脉络，来领会中国“现代性”和“现代化”（包括国有企业）努力的历史经验和内在的正当性。本书提示，应当意识到，我们根据自己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对自己历史的集体记忆和肯定，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合目的性和具合法性的法理基础。具体说来，